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谢冰雪／著

扩大的家族

KUODA DE JIAZU

——
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沙尼研究

—TAOHELILUYU ZANGZU CHUANTONG MINJIANZUZHISHANI YANJIU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扩大的家族

——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沙尼研究

兰州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
谢冰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扩大的家族: 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沙尼
研究 / 谢冰雪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11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3037 - 5

I. ①扩… II. ①谢… III. ①藏族—社会团体—
研究—青海省 IV. ①C232.44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190 号

策划编辑: 杨 青

责任编辑: 张 华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 第十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1/16

字 数: 267 千字

印 张: 14.875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037 - 5/K · 2275 (汉 126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二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编委会名单(修订)

学术顾问：杨建新

主 任：高永久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希隆 王建新 王洲塔

闫丽娟 李 静 杨文炯

杨 青 赵利生 徐黎丽

序

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穿梭在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带沟壑纵横的山谷中。这片流域作为汉藏聚合、农牧过渡、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要津之地倍显重要。在历史上，这里曾是羌族的聚居地，后来众多藏族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1418年，封建王朝在洮河中游实行土司制，直至新中国成立，统治长达530余年。这里深厚的土司文化、部落文化、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

体现在藏族民间组织领域的重要组织形式便是沙尼（Sha Nye），它存在于洮河流域藏族村落，是一种类似于汉族家族性质的血缘性组织。它具备了汉族家族的所有要素：以男性血缘系统为传承的主体；以家庭为最基本单位；聚族而居，有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共同祭祀的对象，从而形成精神的凝聚。然而，相比较汉族家族而言，它有着更为丰富的类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亲房沙尼；在土司时期因买卖田地而至今传承下来的田地沙尼；在新时期因互助需要结合而成的新型互助沙尼。后两种类型的出现超越了“以血缘作为维系边界”的传统家族的界定，在家族的范围、结构、功能等各领域都有所扩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大的家族”。

本书即围绕洮河流域的沙尼展开论述，在充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以下几个部分对其进行论述：①对沙尼的概念、类型以及与藏族部落的其他概念进行辨析，沿着洮河流域描绘沙尼存在的地理边界以及生存的社会空间；②在国家与社会视野下通过对洮河流域不同制度比较下部落的考察来探讨沙尼的由来与形成路径；③描写沙尼结构，并通过与汉族家族结构对比来体现藏族沙尼组织结构的独特性；④通过对沙尼中的仪式和仪式中的沙尼的描写和分析来探究沙尼的影响；⑤从微观情境入手，以探讨沙尼组织的具体互动模式；⑥沙尼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与变迁。笔者试图通过这些内容的描写展现洮河流域沙尼组织的全貌，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为少数民族传统组织研究提供素材，并希望为少数民族农村社

区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在本书中，我以沙尼作为研究蓝本，在家族结构、分家等方面与汉族家族进行比较与对话，浅析藏族部落的概念，对部落发展进行探讨，希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感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对我在学术领域的多年培育，并给予我出版该书的机会。感谢中心所有的老师，尤其是我的导师赵利生教授，无论是田野调查中的言传身教还是论文写作中的悉心指导，都让学生受益匪浅。感谢江波老师、钟福国老师数次的耐心指导与帮助。

作为一本研究“他者”的田野论文，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洮河这片美丽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善良淳朴的百姓。校稿时重温这些关于他们的文字，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幕幕难忘的田野画面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感谢他们毫无保留的配合以及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我的田野生活如此温暖。感谢我的同门师兄师妹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陪伴。在此特别感谢杨政先生，与其同游卓尼的经历让我认识了不一样的卓尼。感谢英加布、刘铁程、王秋花、陈芳芳、樊莹等同仁在阅读本书初稿时提出的意见和评论，让我在书稿修订时受益良多。

谢冰雪

2013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10
第三节 研究方法	22
第二章 沙尼及其边界	26
第一节 沙尼的定义及其类型	27
第二节 沙尼的边界	37
第三章 沙尼演变的历史路径	54
第一节 “仓”与部落	55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传统藏族社会形态之比较	68
第三节 乡村建制与部落变迁	77
第四节 结 论	85
第四章 沙尼的结构	90
第一节 沙尼结构的形成	91
第二节 沙尼结构的层次	111
第三节 扩大的家族——与汉族家族结构的比较	115
第五章 沙尼在传统仪式中的实践	122
第一节 山神祭祀	124

第二节 人生礼仪·····	133
第三节 岁时节日·····	145
第六章 日常情景下的沙尼互动·····	153
第一节 沙尼内部的互动·····	154
第二节 沙尼之间的互动·····	170
第三节 村落之间的互动·····	186
第七章 蛰伏与绵延——“扩大的家族”生长历程的再思考·····	194
第一节 蛰伏——20 世纪中叶以后的沙尼历程·····	196
第二节 绵延——新时期沙尼的发展趋势·····	204
结 语·····	218
参考文献·····	22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一）农村社区研究的现实性

中国的和谐发展，农村是基础。在这十几年来，中共中央一直将农村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工作的重心，不断探索其发展的途径。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伟大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并且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作为建设的目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农村而言，以自然村为村落实体所体现出来的农村社区是农民生活环境的具体形态，因此对于新农村建设方案的执行是依托于农村社区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目前分布着4万多个乡镇，20多万个村落，农村社区的多样性可想而知。如何建设成功的农村社区对于保持农村基层稳定和谐、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深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农村社区研究成为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大量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不可否认的是，社区研究传统的“核心区”聚集于华东、华南以及华北等汉族社区，为此投入了大量

人力、物力以及研究的资源，研究范式相对成熟，而占有我国 75% 国土面积、人口超过 1 亿的 55 个少数民族的社区研究却相对滞后，且传统上将其研究视角主要放在了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的研究上，对于民族社区的地方性知识研究不够深入，从而成为了该学术领域的边缘。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独特的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各民族特有的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因素渗透于民族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其族体的真正灵魂。”^①

拥有不同文化的各个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其所属区域统一按照国家行政区划，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州、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进行划分，实行自上而下的三级治理模式。在乡镇下辖的行政村一级，通过村民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管理与服务。但是，隐藏在行政体制同质性下的村落内部形态却因为少数民族群体的宗教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历史差异、组织差异、区位差异及发展差异等而显示出更多的异质性。比如，通过研究发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社区中，寺坊是其实际的社区边界而不是村落^②；在彝族地区，家支是造成人们之间社会身份区隔的主要原因；侗族的款组织、瑶族的石牌组织、苗族的议榔组织、黎族的合亩组织等传统民间组织的差异导致了民族农村社区建构的差异性。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内以初级群体为其组织方式的传统民间组织代表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社区权威，在乡土社会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对维系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稳定、整合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秩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少数民族农村社区该如何建设？其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如何有效整合？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建设应该有怎样的模式？这些都是我国新农村建设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社区研究的“中间圈”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六大板块’是

^① 杨建新：《论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见《中国民族学集刊》，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② 马小华：《寺与坊：二元视角下探析回族寺坊组织的作用与地位》，载《宁夏社会科学》，2009（5）。

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三大走廊’是指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①。在这个区域分布中，“藏彝走廊”的概念以及提法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这个由横断山脉等一系列高山和由岷江、澜沧江等一系列河流所切割而成的小型地理区域所构成的自然地理单元正处于南北贯通、东西挤压的民族走廊上，追溯其古代历史，“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②，而羌、氐、戎等古代少数民族与现在分布于此地的众多被识别的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受到民族史学者的关注。并且，历史上曾处于“帝国文明的边陲地带”的这一广大区域存在过包括“侯和湟川龙湫道”、“河曲道”、“洮州河州道”、“羌中道”、“洮岷道”、“北山道”、“狄洮道”等众多古道，是陆地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连接之处，它们的存在不仅承担了贯通千百年来地处中原的帝国中心与远至中亚各地的丝绸之路的作用，亦是中原与地处边陲的西北地区、川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四川盆地中生活的各族人民互市、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在这个走廊上，“不同宗教、不同物品、不同势力的分离与交织，为我们研究文化接触、冲突与并存造就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区’”^③，亦引起了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兴趣。

人类学学者王铭铭站在“世界性的空间定位”的角度，提出了“三圈说”的看法，将这一富有特色的民族区域扩展到北到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南至沿海地区的畬族这一环形地带称为“中间圈”^④。“所谓的中间圈，是指古代‘夷夏’之间的一个宽阔的过渡地带。古代华夏世界自视为‘中国’，在其直接统治区形成朝廷与地方关系相对紧密的核心区。在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图式中，高原、山地、草原、海洋被视作一个过渡地带，朝廷与之形成相对松散的关系，在户籍、赋税及行政管理诸方面的渗透程度，有别于核心圈。真正的‘夷’，乃为那些在大一统时代

① 1981年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以“民族社会学的尝试”为题的讲话，见《费孝通文集》（第7卷），200~203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7卷），21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③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④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53~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称臣’于朝廷并与之构成‘朝贡关系’的外圈。所谓的中间圈，恰是指那些‘似夷非夷’、‘半文半野’的‘夷夏’之间的中间地带”^①。在这个地带的“原住民”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谓的“少数民族”，到秦汉之后，不断受到处于分分合合状态下的“华夏世界”的影响，既要受大小不一的王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管制”，又要接受自上而下渗透的“文明”的影响。而且使情况复杂化的是，该地的“原初基质”与“中原”视域下所谓的境外之“夷”、“番”有着历史悠久的贸易与文化关系，这一关系构成的圈子，远远超出了大小不一的王权下的“版图”。^②

这一地带之所以具有研究价值，正是因为历史过程中的“政治上拉锯的局面”使得这个“非文明地带长期与周边文明互动，不免因文明的拓殖与‘精神感召’而产生内部的改变”^③，从而与曾经建立过强大政权且自身民族文化鲜明的民族有着变异性的差距。这种改变正是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少数民族呈现出不同状态和不同发展阶段（如有的被划分为封建所有制、奴隶制）的重要因素。

甘肃处于“中间圈”的西北地带，地处西北的甘肃因为历史上处在中原汉族儒家文化与北部蒙古文化、西北的伊斯兰文化、西部的藏传佛教文化等文化交融的地理区域而倍显重要，更是由于丝绸之路著名的河西走廊而声名显赫。“边风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千年的钟声终将逝去，褪去历史所留下的耀眼光环之后，千百年来活跃于这一土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回、藏、东乡、保安、撒拉、裕固、蒙古等民族成为我们所关注的对象。这些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因其长期处于各种文明的边缘地带而具有了“中间圈”的“似夷非夷”、“半文明半野蛮”的特点，比如活动于青藏高原东北端甘肃南部的曾经游离于吐蕃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藏族，其历史发展轨迹与形态就不同于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而这些特质也体现在撒拉族、裕固族等其他少数民族身上。

这些“中间圈”区域的民族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与生存状态？其融入于本民族血液中的既不同于中原文明又有别于“曾建立过强大政权且自身民族文化鲜明”族体的“地方传统”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怎样的角

①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1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②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10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③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15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色?是在现代化的洪流中逐渐消退,还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而激发出新的活力?这些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在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形势下应该选择怎样的建设途径?问题存在的现实性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社区研究的“中心圈”。而现实情况是,位于“中间圈”内的少数民族在其社区研究方面正遭遇着社区研究边缘的命运。本书将着眼于甘南洮河流域藏族传统民间组织的发展模式及其互动网络在现代生活中的适应,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与努力。

(三) 聚焦“沙尼”

对研究对象沙尼的关注,缘起于笔者在2007年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建和谐社区——西北少数民族乡村社区整合的实证研究”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进行田野调查时的意外收获。

卓尼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藏彝走廊的最北端,被认为是“藏汉族群分界线上重要的地理单元”^①。其境内河流深切、高山梗阻,发源于甘、青、川交界西倾山脉的洮河水湍流而下,众多的藏族村寨分布在洮河两岸沟壑纵横的山谷之中。卓尼不仅地理位置独特,而且有着500多年土司统治的历史,传统而独特的地域文化保留完整。

调查组所选择的是位于洮河南岸、距离卓尼县城15公里的一个藏族村落——拉力沟村,之所以选择这个村子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①该村98%以上的村民为藏族,是传统的藏族聚居村落;②民族特征明显,民族文化保留相对完整;③当地使用藏语和汉族两种语言,语言沟通无障碍;④所选村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村落社区具有完整性;⑤地理位置条件相对便利,交通相对方便,便于调查者对外沟通联系;⑥所在地点安全性较好;⑦所选取地点有熟人引荐,调查者食宿等问题可以解决。当和这个村子顺利建立起联系之后,调查组在这里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深入调查,对该村的传统组织、婚姻、丧葬、宗教、村落权力、文化变迁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对村落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村民日常生活的实践进行了参与观察,希望能够有效探索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整合的途径。

在调查期间,“沙尼”(当地方言音译)这个词汇不时地出现在访谈对象的话语里。无论是谈到传统信仰仪式或是红白事这样重大的人生礼仪,还是谈到村落治理中的民间纠纷调解,或是谈到日常互助,都不时出现“沙尼”这个词汇:“沙尼们要插箭呢”,“请客吃饭要怎么做,这全都

^① 宗喀·漾正网布等:《卓尼生态文化》,4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

沙尼商量”，“像家里老的去世了，家里这个儿子，赶紧把这田地沙尼、亲房沙尼都通知给”，“吵架了，沙尼们劝着呢”，等等，让我们意识到沙尼在这个传统的藏族村寨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沙尼是什么？查阅当地的文献资料，并无记载。

于是，课题组成员在讨论之后，把沙尼作为调查对象展开专门的调查，以访谈为主，调查问卷为辅，并根据调查结果绘画出村落地图以及沙尼谱系图，终于弄清了什么是沙尼。在当地，大多数重大仪式或日常互助的实践，其行动的主体并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沙尼。沙尼，是一种类似于汉族家族性质的民间组织，且具备了汉族家族几乎所有的因素：以男性血缘系统为传承的主体；以家庭为最基本单位；聚族而居，有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共同祭祀的对象，从而形成精神的凝聚。然而，不同于汉族家族的是，沙尼的层次、类型、结构等更为丰富，存在“亲沙尼”、“一般沙尼”、“外沙尼”等多个层次，还存在“亲房沙尼”、“田地沙尼”、“新型互助沙尼”等多个类型。

当这一阶段的调查告一段落之后，笔者开始着手查阅与这一现象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请教藏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发现沙尼（ཉེན།）在藏语辞典里是“弟兄或亲戚、近亲”之意^①，但民间不同地区对其界定差异甚大，对于沙尼现象的论述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②。于是笔者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短期进入卓尼地区搜集资料，对该现象进行了解，发现被临潭县和岷县地域所割裂的洮砚乡、藏巴哇乡等地的藏族农村中并不存在沙尼组织，而洮河上游、中游两岸，西从碌曲县则岔乡等地农区、东到卓尼县纳浪乡等大片洮河流域皆存在沙尼这一传统的民间组织。那么，沙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在当地是怎样运作的？发挥着怎样的功效？在不同区域有何差异？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于2008年冬季又重新回到拉力沟再次深入调查，并且进入该村周围其他村落进行调研，发现洮河流域一带沙尼这一组织只存在于藏族村落之中，在回族村落、汉族村落以及在以汉族为主的汉藏杂居村落中的汉族中并不存在。并且，在不同村落形态中沙尼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比如在单血缘村落中沙尼只有一种形式，而在多血缘混居村落里它存在多种形式；在“措哇”（藏文མུ་ཁ།，部落的一种称

① 张怡荪编：《藏汉大辞典》，282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② 全部调查结束后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笔者查到一篇涉及本研究领域的论文，见桑才让：《青海海东藏族村落中的“夏尼”组织初探》，载《青海社会科学》，2004（4）（注：“夏尼”为Sha Nye的地方性音译）。

谓)记忆深远的村落里它的表现形式简单,而在无“措哇”记忆的村落里它的表现形式复杂;等等。而且,它作为目前洮河流域藏族村落中除家庭之外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同藏族部落中的“日科尔”(藏文རྩེ་ཁོར།,部落的一种称谓)、“措哇”(藏文ཆོ་བ།)等组织形态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基于这一现状,笔者决定对沙尼的历史来源、组织脉络、不同区域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在该区域农村社区中所发挥的功用等问题进行全面的专项调查,并将该研究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传统社会组织与社区和谐——洮河流域藏族传统社会组织沙尼与社区整合的实证研究”。在社科基金的资助下,笔者于2009年夏季第三次深入卓尼,沿洮河而上,进入碌曲,考察洮河沿岸的村落形态、不同形态的村落中沙尼的具体表现形式及沙尼的日常实践及仪式等内容,并且又于2010年4月、2011年3月进入洮河上游碌曲、夏河境内进行田野调查以及访问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请教其对于沙尼的理解与看法。数次的田野调查历时3年,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笔者将这些调查成果纳入本研究的素材之中,通过对沙尼的全面研究,试图以传统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中的实践角度来探讨当地藏族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本土经验。

二、研究意义

存在于洮河流域藏族社会中的传统民间组织——沙尼是当地村落中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元,对于当地藏族百姓来说,历史悠久的沙尼已然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组织形式之一,其“形散神不散”的独特组织结构,使沙尼虽历经社会变革仍存续至今。显而易见,一种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必有其契合当地特色历史文化与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质,厘清它的生长脉络与生存空间无疑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深化我们对甘青川边界藏族社会结构的认识,对于该区域藏族社会发展、农村和谐社区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可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 学术意义

首先,沙尼组织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是对藏族传统民间组织制度研究的重要补充。藏族是一个分布地域辽阔且历史悠久的民族,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历史上不同政权在不同区域统治政策的差异造成了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的差异性。“元朝统一藏族地区后,前后藏地区确立了比较完整的领主庄园制,经过萨迦、帕竹、第悉藏巴、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统治,寺院、贵族、地方政府三大领主占有农奴和庄园成为前后藏地区基

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在青海、甘肃、四川的藏族地区，历元、明、清三朝直至解放前，中央政权采取了封给藏族部落首领官职，准许其世代承袭的土司制度，使部落的组织形式一直保存下来。”^① 显然，位于藏汉边陲的甘南洮河一带藏族的部落制度与青藏高原腹地的庄园制是有明显的组织差异的。另外，实际调查表明，在甘、青、川地区不同地域的土司或部落制度下的具体组织形态，也因其自然环境、生计方式及统治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就部落组织自身结构的变化而言，因历代中央王朝以及地方政府对藏区各地施政管理的程度不尽一致，有关各地部落组织结构的变革程度也就存在差异”^②，这在美国藏学家罗伯特·埃克瓦尔（Robert B. Ekvall）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在东北藏的众多部落中，据我所知有两个部落在结构和组织上不同于其他大部分的部落。就其他部落而言，帐房营地是部落内部唯一的单位，而这两个部落却有一个中间组织称为措哇（thsu - ba）”^③。这种差异延续至今。因此，在本项研究中，笔者首先对洮河流域藏族的沙尼与藏族部落中的“日科尔（རྩོམ་རྩོམ་པ་ལྟོས་པ་）”、“措哇（ཚོ་བུ།）”等概念从组织规模、形态方面进行全方位比较，这样有助于厘清这一区域藏族部落发展的脉络，探析部落发展差异的原因。

其次，沙尼组织的调查研究，为“中间圈”中各族群形态比较研究提供了素材。“中间圈”虽然是一个学术概念，但是其以丰富的民族研究内容成为民族学者的研究重地。尤其对于活跃于“汉藏走廊”、“藏彝走廊”这一广袤地带上的族群而言，处于边陲地带，多种势力并存和交错，“历史上活跃着相对独立的政体（即费先生所说的地方政权），而到宋以后，这些相对独立的政体已纷纷解体，围绕其政体存在的周边‘核心群体’变成受朝廷委任的土司、番官、头人间接治理的‘边缘群体’”^④，这类“天高皇帝远”且各自为政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目前我国这一地域少数民族的主体。这个地带的少数民族因其长期处于边陲且受到“文明”的辐射有限，既与周边各政权发生着频繁的联系，受到各种政权的争夺，又相对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形成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位于“中间圈”西北角的洮河流域的藏族，其文化与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

① 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3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② 陈庆英：《藏族部落制度研究》，100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③ [美] 罗伯特·埃克瓦尔著，宗喀·漾正冈布、刘铁程等译注：《戎哇与卓巴：甘肃汉藏边界的藏人定居者与游牧民》，载《民族研究》，2009（3）。

④ 王铭铭：《中心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1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比较而言发生了变异。对于这一流域内藏族现实生活形态的考察，不仅是对藏族研究的一种补充，也为“中间圈”内其他族群比较研究提供了素材。

再次，中国境内的家族组织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家族（最主要的是东南地区发展完善的宗族）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学术研究范式，而对于少数民族家族研究范式的缺失是其研究缺陷。位于洮河流域的藏族沙尼组织的这种“扩大性的家族”特征，能够为中国境内家族组织制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从而完善家族制度在整个中国社会形态领域的研究，为中国家族的研究提供另一种范式。

最后，在和谐社区构建中，社区整合是社区建设的难点。整合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三种。制度性整合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实践，是将其政策、法规、法律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和控制的轨道；功能性整合是将其社会化分工出现的异质性加以整合；认同性整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性整合。对于社区整合而言，社区成员认同性的增强是社区建设的重点，因为无论是制度性整合还是功能性整合都需要“通过社区的微观认同来树立它的权威性”^①。在本土化的农村社区，作为内生性秩序的传统民间组织，可以作为一种社区整合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对其理论模式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二）实践意义

拥有550万人口的藏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位于甘青川边界的洮河作为黄河一级支流，其上游和中游是甘肃藏族的重要聚居区，代表着藏族东北部地区的发展形态，其生存和发展对西北地区稳定与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对这一组织的了解，可以把握该区域内藏族百姓当今生活的真实状况；通过对该组织的全面研究，可以把握当地藏族的内生性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推动其有效发挥整合功能，维护当地藏族百姓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对该组织的研究，是从宗教以外的视角探索藏族和谐社区的建设途径，兴利去弊，保障百姓的权益，从而为全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① 黄玉捷：《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载《河南社会科学》，1997（4）。